

税收与文化系列

高献洲 / 著

中国发票史

——
发票源流探

中税出版

中国税务出版社

税收与文化系列

高献洲○著



中国发票史

——
小发画

探考记

中国税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发票史：发票源流探考记 / 高献洲著. —北京：
中国税务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7-80235-609-2

I. ①中… II. ①高… III. ①税收管理 - 原始凭证 -
经济史 - 中国 IV. ① F8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8582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 名：中国发票史——发票源流探考记

作 者：高献洲

特约编辑：育向荣

责任编辑：刘淑民

责任校对：于 玲

技术设计：刘冬珂

出版发行：中国税务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11 号国宏大厦 B 座 18 楼

邮编：100038

<http://www.taxation.cn>

E-mail: taxph@tom.com

发行部电话：(010) 63908889 / 90 / 91

邮购直销电话：(010) 63908837 传真：(010) 63908835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宇星印刷厂

规 格：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20

字 数：291000 字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35-609-2 / F · 1529

定 价：40.00 元

如发现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序

当“玩票”升华到治学

我曾经把自己奔突于学问的那种旁若无人、孤芳自赏、妄自尊大、自得其乐的感觉，戏称为“玩票”。因为不仅寄望于结果的美好如意而且陶醉于过程的清新可人，“玩票”实在是一种可以不问世事自求平衡的高妙体验。不过，我的玩票同高献洲先生比起来，实在又有些小巫见大巫了。第一，他玩的是真正的“票”——老发票，于是当得实实在在、资深考究的“票友”；第二，他玩得是那样的细致、细腻和细嚼慢咽，以至于每每深入到每张老发票的细枝末节，就连几十年前流行于发票之上的特殊语言“苏州码子”都可以自主破译，并对诸如干支纪年、货币换算、商家字号等涉票元素都如数家珍；第三，他不限于仅仅是对老发票的收藏和鉴赏，而把自己的触觉延伸至对中国发票史的参研中，并借此把自己搜求老发票的过程升华到了追寻史料的过程——如王振忠研究徽商、谢泳研究文学那般；第四，由于治学的需要，“玩票”的深度和广度更加拓宽，诸如制票工具——发票印版、填票工具——发票印章、涉票制度——特定地区的管理

办法、载录发票信息的资料如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稀见税刊《税工研究》都进入了他的收藏视野；第五，为明晰确认发票的原委，他到北京报国寺、太原文化宫搜购，他赴发票重镇考察，他到图书馆、档案馆“索隐”，他在孔夫子旧书网盘桓，甚至为了一张自己正需要的老发票而不惜与人竞价长达一个月；第六，当他从“玩票”升华到治学，早年就形成的博览群书、过目不忘的长处大大强悍着他的羽翼，以至连《茅盾文集》、《袁水拍诗歌》、《郑逸梅小品》，都构成了他的参考文献和灵感来源。

因为“玩票”层次上的这些差距，我不具备为献洲这本《中国发票史》作序的资格。可是，不论如何勉为其难，我又责无旁贷于从第一波读者的角度谈谈阅读感受。这是因为：我是他从“玩票”到治学的整个过程中最为知情的人，又是在这一过程中时时絮叨几句的一个探讨者，还是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推波助澜的起哄者。事实上，从我2004年借助他一大卷老发票的支撑而推出《发票撷趣》一书，我这个并不收藏发票的假“票友”就与他、毕志夫这些真“票友”，因老发票这一话题捆绑到了一起。这样的捆绑并不仅仅表现在我与他一起去市场上寻票、去公园或马路上聊票、去他的家里研票、去办公室论票、去河北纳税人网或一些大学讲票，还被一些外来事件注解着。仅仅因为早出版了三年，我的《发票撷趣》同饶立新的《中国印花税与印花税票》一样，成为献洲的书中被多次征引的“文献”。这也使得人们顺理成章地视我二人为关联著述者。比如山西省某市地税局的发票科长，为充实自身的发票文化资源，“百度”到了献洲的《漫话老发票》和我的《发票撷趣》，循着我的电话而与献洲接上了头；国务院法制办在修订《全国发票管理办法》准备借重于“专家”力量时，也次第同我们二人对话；湖南的一个老发票爱好者，在写信向献洲要了他的《漫话老发票》后，继而想当然地认为这同处石门小城里的二人是相熟的，干脆又向他索要我的《发票撷趣》。从原来的同事关系，经由他的进入税务代理行业并在业余时间迷上了“玩票”，和我的自我放逐于“科研”部门并将业余精力投诸税收文化，我们二人的关系很自然地置换为一种论学之交。再经过我的《发票撷趣》倚仗了他辛苦搜寻来的发票旧物，而他在《漫话老发票》中又多次地引

用《发票撷趣》一书，这样的论学之交借了坊间反映在发票文化上仅有的两本书而更近一层。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成为献洲从“玩票”到治学升华过程中最为切近的观察者。而我之所以敢于斗胆作序，也是凭了这份相互的深知和信任吧。

献洲将其业余精力投入于老发票的收藏，可以追溯到2000年。后来，他离开税务岗位并凭其在近五十岁的年龄拿到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进军北京税收筹划领域，时而在执业之暇逡巡、游弋于潘家园、琉璃厂、报国寺的旧货摊前，寻觅在自己的专业视野之内而又能增添自己业余情趣的藏品。后来他选中了老发票。这是当时根本卖不出什么价格来的一种收藏品类，他甚至曾经用几十块钱拿到厚厚的一捆——这样的机会在他的《漫话老发票》出版后再也难遇。他首先确定的一个专题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同业公会的发票。因其制作精美且管理信息丰富，并蕴涵了当年税务机关借助同业公会进行发票管理的诸多线索，迅速地引起了曾经从事过发票管理的献洲的密切注意。七八年过去，他的这一主题的收藏已经是洋洋大观，几乎可以涵盖当年几百家同业公会中的十之八九。

2003年的一天，他回石家庄休假，把数卷发票藏品给我看。我如获至宝，并在征得他同意后将这些发票以“方寸纸页里的中国经济史”为题，复印收存。这也迅速地成为我和经济科学出版社合作的“税收文化丛书”中的第一个选题——2004年5月，我以发票文化为切入点的《发票撷趣》一书出版。因为该书的“后记”被裁，所用几十张发票取自献洲的这一背景未能做出说明，我也因而时时萦绕了一股类似“剽窃”的不安。令人快慰的是，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激发和撩拨了献洲写书的欲望，并因此大大地扩充了他收藏老发票的主题范围。于是，到2007年，《漫话老发票》出版，并以此标记了他在发票收藏领域不可撼动的“票友”资格——在收藏界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是大量收藏而未曾把这些文物的鉴赏形之于文字、讲义或著述，是不能称其为鉴赏家也不能堂而皇之地自诩为“票友”的，就像那些梨园里

的“票友”绝不仅仅是会哼上几句就有资格与名角一起登台献艺。这样的票友，如马未都、谢咏、谢其章、方继孝等，都是收藏有年、鉴赏有术且著述有法的人。而献洲自从出了这本书，他就一下子越出网上早就流传其名的发票收藏诸“前辈”之前，腾乎其上，登堂入室矣。此书一出，多位在发票收藏上浸淫多年者，也开始找寻出版途径；此书一出，旧货市场上的老发票，也突然心领神会，豁然开朗，鸟枪换炮，价格大涨；此书一出，献洲成了旧货市场上的名人，不仅货主会把他与那个把“连环画”买贵了的崔永元相提并论以便哄抬自己的价格，更有“好事者”与他明争暗斗，抢着出手把他可能会喜欢上的老发票席卷而去，指望着哪一天可以“囤积居奇”；此书一出，立即有头脑敏锐如河北纳税人网者，为他开设了“高献洲老发票博物馆”——这又算得上是一种“票友”献艺吧。

可献洲并不满足于限定在“票友”的层次止步不前，随着他的藏品越来越丰富，他开始转向了对发票史的探求。而这样从玩票到治学的升华，又因为他自信、雄心和胆气的勃发，而丰满、强悍和充实起来。

一次在北京逛书市时，我建议他把第二本发票著述题为《中国发票史》或《中国发票源流》，他极谦逊地拒绝了。他最初所选择的是一个很有伸缩度的书名：中国发票百年。然而这也面临了一些悖论：一则，他的藏品中最早的一张，开于咸丰二年（1852年）。而他对这张来之不易的票喜爱有加并准备诉诸相当篇幅的文字。即便他想把自己的探讨止于《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颁布的1986年，这中间的跨度也不仅仅百年。二则，“中国发票百年”的书名仍然偏于浅显，这势必又会像我们的《发票撷趣》、《漫话老发票》一样重蹈被视为通俗读物的前辙，而这与他想写一本学术著作的初衷是相违的。三则，写过这本书之后他想趁热打铁再完成一部姊妹篇“中国税票百年”，而“税票”藏品的丰富与绵延更是“百年”所不能涵容的。经过了几年的精心准备他逐渐有了足够的信心和心理准备，于是，命名一个更具学术感觉的书名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今天，我们看到了高献洲先生从“玩票”升华到治学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果——《中国发票史——发票源流探考记》。尽管私人修史总是有着这样那

样的困难，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官方修史者或专家修史者的质疑，可当专家和官方还不大可能对某种微观事物引起足够关注，私家修史就不仅成为可能和必要，甚至成为先知和先声。史是一种“学术”，而学术乃“二三素心人商量培育之事”。在发票史这个小众空间里，因高献洲这个素心人首先拥有了史料、用心、执著和知识准备，他也就成为修这门“小史”的最合适的人选。更何况，修史自有其学理上的规定性，私家、官家或专家都一样需要遵循。对于老发票这一藏品、史料和物证而言，当票友向学者转化，读者们所能享受到的深层次、宽视野、广领域的阅读快感，也自然更多。

作为本书的第一波读者，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

从行文脉络上看，本书厘清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发票产生、成长、发展、完善、规范、制度化的整个过程。从晚清时期发票从契约或者“发帖”脱胎而出，到民国时期发票样式受到中西商业文化交融的影响而从书契式向表格式转型，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同业公会主导下半统管环境中发票票面信息的日益丰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管理下涉税功能的日益追加，甚至包括现代纸质发票向电子发票、网络发票的演进规律，高献洲先生都在物证、考证和论证的基础上，描绘出一个清晰的线路。尤为难得的是，他通过对各个时期老发票所载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尽力复原了当时当地经济、商业、税收的大致图景。为了达到把每一张发票上揭示的经济社会信息读通读透的目的，他博访遐寻，究源探委，唯物唯实，颇下了一番苦功，并将其匠心和眼力呈现在本书的字里行间。

从学术贡献上看，本书提出了一些在发票史上并影响到税收史、经济史的推论和论断。作者借助于相关器物、文本、档案，次第深入到人物典章的深层纹理中，为发票在整个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机理和线条做了较为清楚的推演和考证，并尽求合理地得出了一些可取、可信和可资参考的结论。比如他的关于发票起源的两个基本结论：“导致发票产生的商业规模应当出现于明代，即发票是伴随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标志性的生产力发展现象而产生的附带品”和“契约和发票的分道扬镳应该始于明清”，不仅吻合于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还得到了发票藏品的有力支撑。再如他对民国“发票重镇”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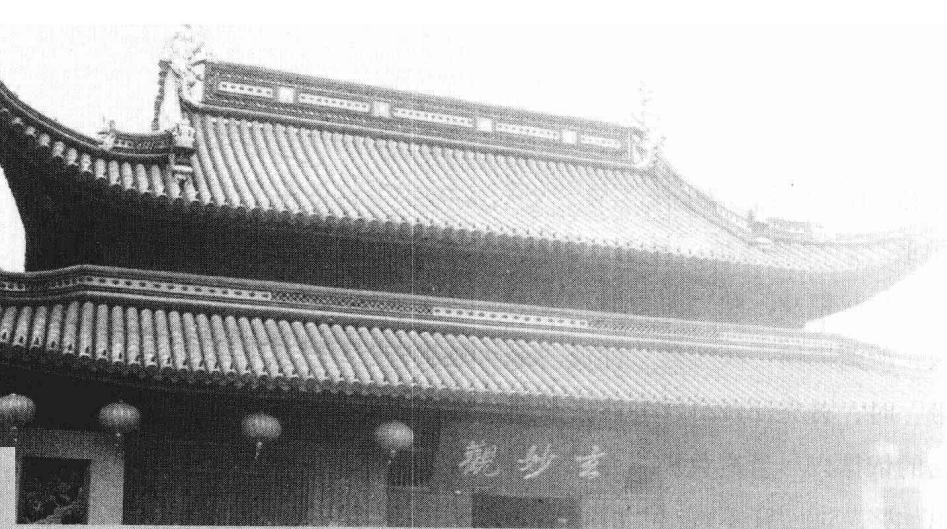
种依存于经济、商业、文化发展状况的发票生态的认定，是建立在丰富且多层的发票“化石”的基础上：从市到县，再从镇到乡村，献洲的结论生成于实实在在的物证间。

从现实意义上看，本书为发票管理者、发票收藏者、发票研究者等人群提交了一个知源流、识兴替、究是非、明成败的道具、脚本和手册，并有望对今天和以后的税收管理、商业运营、诚信相交等更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关系以相应的启示。对于发票管理者而言，高献洲对于各个不同时期发票的印、领、用、存、查、处等具体技术的悉心爬梳，定会让你产生“原来如此”的通透感受；对于发票收藏者而言，高献洲植根于各种鉴赏技能（如读票功夫）而后胸有成竹、驾轻就熟的藏品解析，足以让你面对复杂的记数、纪年、货币等审票道具豁然开朗；对于发票研究者而言，高献洲基于发票藏品并在典章制度、人文地理、企业流变、社会兴衰等方面所投注的扎实工夫，必将扩张你的视野。

有感于此，我怀了跃跃欲试的急迫，期待着来自税收、企业、会计、收藏、学术等领域的读者诸君，对献洲这部“班门弄斧”之作给出中肯的反响。倘若因为这样的反响而进一步地扩张了“玩票”者的阵容，提升了票友们的境界，也就不枉献洲十年如一日的孜孜耕耘。

此权为序，并就教于玩票诸公。

清苑李胜良 谨识



前

言

(一)

中国的发票究竟起源于何时？它是如何按照一定的轨迹逐步发展的？它的未来方向在哪里？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于我曾经从事的发票管理工作以及后来迷上老发票收藏的过程中，只不过由于职业、学识、涉猎范围、思维方法等方面的限制，其答案显得格外的遥远。2007年《漫话老发票》^①一书正式出版后，我尝试着依据对发票藏品的整理、鉴赏、分析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和疑问来寻求一些资料的支持，结果是取得了至少我认为比较有价值的线索和发现，产生了继续探求下去的欲望。我发现，探究某一器物的产生与发展这样非常严谨、非常学术化的课题，对于一个不具备专业史学理论基础而又兼有生存压力的普通人来说的确很难，但尚未难到一种不可为、不能为、高不可攀、深不能及的地步。有了这种想法，在发票藏品的数量渐丰、质量渐高的情况下，我走上了一条艰难而又有趣的发票研究、探索之路，并萌生了以个人之力撰写一部《中国发票史》的心思。我个人认为，在

^① 拙著《漫话老发票》由中国税务出版社于2007年5月出版并列入该社“税收与文化”系列丛书。该书是本人在收藏过程中对老发票的整理、分析、鉴赏的心得集成。本人的老发票收藏活动始于21世纪初，现已集有包括晚清、民国在内的老发票上千张。

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之后，“平民”修“史”应该至少具备两个方面的素质：一是“勇敢”，二是谨慎。所谓“勇敢”，其实是鼓足勇气，壮着胆子，硬起头皮，打起精神，勉力而为地“闯入”似可称为专家、学者专利的课题研究领域；所谓谨慎，其实是一种极“笨”的办法：不轻易下结论。面临“空白地带”时，首先怀疑自己的涉猎范围；遇到歧异误论时，当然应该重复检验自己的依据以尽量避免班门弄斧、贻笑方家。本书正是在这种如履薄冰、“汗出如浆”或“汗不敢出”的心境下完成的。^①

据我所知，中国发票历史这样一个说不上大也不能算小的研究课题，在全国范围内很少有人触动过，也就是说，这应是一个研究上的空白。形成这种“空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发票这一事物居于经济领域的末节而未能得到人们的关注^②；可能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导致不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使人望而却步；也有可能是人们忽视了发票的历史对于现实发票管理的指导作用而不屑一顾。专家、学者也许只专注于事物的“根本”而不屑于屈尊采摘无关大局的“枝叶”，而发票实物或实务的研究者则可能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力不从心。我搜寻了一下，近十余年出版的有关发票的著作中涉及发票历史的著作有如下：

- 吴国君、王世昌编写：《发票设计与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10月）；
- 张树学、朱明建编著：《发票管理基础知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
- 周庭槐主编：《发票管理与检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
- 姚延公主编：《发票基础知识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① 在专家、学者们的眼里，平民显然并不具备修“史”的资格。朱家潜在给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作序时说：“世襄之所以能完成这样一部煌煌巨著，是因为他具备一些非常难得的条件。所谓难得的条件并不是说他有坚实的文史基础和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因为这只能算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必须具备的条件……”其意昭然。

^② 我们一般是按照以下“目录菜单”顺序进行“点击”才能触及发票的相关内容：经济领域—税收领域—征收管理—征管制度—发票管理。

● 宋冠军主编：《税务登记与发票管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

● 张树学、刘延波、徐建军、汪月华等编写：《发票管理实务》（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

● 本书编委会编：《发票使用管理检查实用手册》（中国税务出版社，1996年）；

● 陈贻金等主编：《发票管理使用指南》（航空工业出版社，1997年）；

● 李胜良：《发票撷趣》（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 张庆龙主编：《发票管理指南》（北京时代出版社，2005年5月）。

可以看到，上述书籍大多是发票使用管理实务方面的专著，撰写人员也大多是税务实务研究方面的内行和专家。他们并不以发票的历史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内容也大致限于何朝何代有何物可以归入发票类下这样一些标志性、基础性的问题，基本上是一种对于发票管理实务内容的陪衬。李胜良的《发票撷趣》从独特的视角对发票的产生和发展做了考证，一些观点充分体现了一个税收学者敏锐的目光，比如“泛发票管理时代”和“前发票管理时代”的划分，比如“非税控状态、半税控状态、归口管理状态和强化管理状态”的发票发展脉络界定等即是，但由于发票问题并不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因而其考证的过程缺乏更为全面的原始资料而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很明显，有关发票历史研究的一张白纸上还可以有广阔的发挥空间。带着向他人“炫耀”收藏成果的欲望和初涉研究领域的惶惑，我大胆地闯入这个空间，讲述发票的故事，还原发票的真实面目，以期发挥“古今鉴照”、“以古鉴今”之功效。

（二）

在我开始探究发票发展史实的时候，我国的发票管理已经逐渐完善。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说，我的研究努力显然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自1986年10月《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颁布以来，我国的发票管理工作逐年加强，管理法规不断完善，管理人员不断增加，管理手段逐渐信息化，管理内容和管理范围也得到了相应的扩充和放大。作为一种财务收支凭证和治税工具的发票，其功能和效用已经充分地得到了发挥，具体到某一税种而言，这种功能和效用甚至已经达到了维系其存在的重要地步（比如增值税专用发票）。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描述《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颁布二十多年后的发票管理现状和规模：

● 发票管理法规

1986年财政部颁发的《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共有20条，约3500字；1993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第6号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12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以国税发〔1993〕157号文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其中《办法》45条，约5500字；《实施细则》61条，约9000字；1995年10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7号主席令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其他具体的配套法规如《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等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并多次修订。包括法律、法规以及部门的规章、地方性的规范性文件在内，发票管理法规已经形成一个税收管理的分支体系。据业内人士透露，为适应新的税收征管工作的需要，《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进一步修订正在广泛的讨论和征求意见中。

● 机构和人员

全国市、县级的税务机关普遍建立了专门的发票管理机构或设置了专业人员。这些发票管理机构有的称发票管理所，有的称发票管理站，专门负责发票的印制、管理工作并相应地具有行政处罚的权力。

● 管理手段

以计算机为工具的网络系统成为当前发票管理的主要手段，其中国家投资上百亿元的“金税工程”中，防伪税控开票系统、防伪税控认证系统和发

票协查系统构成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最为有效的现代化管理手段。2009年7月1日，东莞市开出广东省也是我国第一张网络发票，更为发票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 管理程序

发票管理程序已经涉及发票的印制、领购、使用、填开、保管、缴销以及违章处罚等各个环节，并且各环节均已建立具体的分项管理制度。

● 管理范围

发票的管理范围已从过去仅限于工商业的状态扩展到更多的领域。除国有金融、保险企业的存贷、汇兑、转账凭证、保险凭证，国有邮政、电信企业的邮票、邮单、话务、电报收据，国有铁路、民用航空企业和交通部门国有公路、水上运输的客票、货票等专业发票外，包括高速公路收费凭证、公园门票等在内的所有应税领域所使用的凭证已经全部纳入税务机关的管理范围。

● 发票的防伪措施

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规定各地采用的发票防伪措施包括：①发票用纸，包括水印纸、水印无碳纸、彩色纤维加无色荧光纤维水印纸、干式复写纸等。②防伪油墨，包括大红色油墨，紫光灯下呈桔红色反映（一般用于发票监制章）；无色油墨，紫光灯下呈绿色反映（一般用于票面中央的防伪字样或标记）等；③发票防伪编码，包括发票的分类代码和发票号码。

● 发票的用量

关于发票的用量，一直没有全国范围内正式的统计数字。我根据一些相关的统计资料和数据进行推测，或者以局部的数字作为一种参考。

据浙江地税网站公布，“税友2006”征管信息系统发票管理模块统计显示，2009年3月，全省各地区共计上报发票印制计划1.74亿份，2009年第一季度全省地税共计上报发票印制计划3.6亿份。按此推算，浙江省地税全年发票用量可达到14.4亿份。另据河北省地税局的准确统计，2009年全省地税所管用票户使用各种发票达到9.2亿份。

按照浙江、河北两省的平均数推算，每年的全国地税发票用量达到300

亿份以上。强调一下，这里并不包括国税系统所管纳税人即增值税纳税人的用票量。

按照国家统计局第二次经济普查公布的数据，全国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达到4000多万户，其中法人单位700多万户，产业活动单位880多万户。如果按平均每户每年用票2000份计算，全国用票量达到800亿份以上。

二十余年达到如此的规模 and 高度，已经证明了国家对于发票管理投入的不遗余力，而这种全力以赴的决心，则直接来源于国家“对其在厘清应税对象、监控税源变化、增强征纳互动方面所寄予的厚望”。^①也就是说，国家期望发票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发掘出的治税功能重新发挥巨大的作用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需要。客观地说，强大的发票管理机制确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在控税方面成效显著，但其发展过程中也一直伴有不和谐音，时至今日，假发票的肆虐和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制成为发票管理者最为头疼的难题。

发票的违法行为始终存在于发票管理的发展过程中，或者说正是发票的违法行为才促进和形成了今天的现代化发票管理模式。归结一下，真正给管理者出了“难题”的其实只有两件事：一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二是与《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同龄”的假发票制售犯罪。前者在国家投入巨资建设“金税工程”后有所遏制，而后者在国家法律的不断打击下似有愈演愈烈之势。

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增值税实行“价外税”并且凭借增值税专用发票实行抵扣制度，发票这一被税务机关长期以来频繁使用的治税工具在新的税制体系中格外引人注目。可以说，即使是作为治税工具，此前发票的功能也是辅助性的，而此时已经将其推到了维系一个税种的存在乃至决定整个税制改革成败的风口浪尖上。在发票的发展史上，不可以不记录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它使发票第一次具有了“准税票”和“准货币”的功能；它也使发票第一次染上了鲜血并一发而不可收——从1994年至今，

^① 李胜良：《发票轶趣》第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

全国因增值税发票犯罪被判处死刑或死缓的已经有200多人。

2009年，是全国范围内打击、整治发票犯罪专项行动年。2009年10月27日，公安部就打击、整治发票犯罪专项行动公布的数字是：全国立案查处发票犯罪案件3205起，比2008年的全年案件总数增加了50%，其中假发票缴获量在10万份以上的重大案件65起；全国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134名，捣毁制售假发票窝点1045处，打掉职业犯罪团伙664个，分别比上年全年总数增加了1.7倍、1.4倍和0.6倍；缴获涉及商业零售、餐饮服务、建筑安装等各种行业的假发票8025万份，比上年全年缴获总量增加了1.94倍。全国已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假发票缴获量超过50万份，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川分别超过400万份，河南、广东分别达到了900万份和2839万份。

国家公布的案情和数字，让人看到了专项行动成果的辉煌，同时也看到了假发票“黑洞”规模之巨大，总之，实在太过触目惊心！

一面是治税的“良方”，一面是误人的陷阱；既可以使人守法经营获取经济利益，又可使人沦入万劫不复之地。现代发票这种善恶并存、集天使魔鬼于一身的特性使人又爱又恨，百感交集。其实，发票本身是“无辜”的，它被人为地推到超乎寻常的地位，它以相对羸弱的身躯承受了本不应如此沉重的负荷，它代替“主创者”们艰难地忍受着自“入世”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

带着这样的认识，我在面对数十年、上百年前的老发票时，眼前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幻影：一张张发黄的纸片忽然活了，它们为“发票后辈”庞大的家族中兴旺的“票丁”们所获得的时尚发出由衷的感慨，也为“后辈们”不断致人沦丧、毁人性命和自由而痛哭流涕、顿足捶胸。

(三)

看一看发票的过去，也许会洞悉发票的未来。我期望通过对发票源流的考证和介绍，为管理者们找到治疗发票痼疾的“良方”提供历史的线索。

我知道，杀多少人的头，判多少人入狱，肯定不是发票管理者们的初衷。他们的意图是通过严厉的法律手段来压制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以获得



发票世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清平。然而，和谐社会毕竟不是或不只是靠酷刑和重典来取得的，发票及发票管理的未来究竟在何方？

讲一个《列子·说符》中的故事：

晋国苦盗，有郄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焉。晋侯喜，告赵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国盗为尽矣，受用多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盗，盗不尽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盗谋曰：吾所穷者郄雍也。遂共盗而残之。晋侯闻而大骇，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盗何方？”文子曰：“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且君欲无盗，莫若举贤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则何盗之为？”

《东周列国志》中对该故事有所演义，改赵文子其人为羊舌职：

晋景公闻羊舌职之言，召而问曰：“子之料郄雍当矣！然弭盗何策？”羊舌职对曰：“夫以智御智，如用石压草，草必罅生。以暴禁暴，如用石击石，石必两碎。故弭盗之方，在乎化其心术，使知廉耻，非以多获为能也。君如择朝中之善人，显荣之于民上，彼不善者将自化，何盗之足患哉？”

再来看一张发票实物。

图1是1979年德国（当时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销售一头种牛的发票，我以极廉的价格在北京报国寺淘得。与其一并获得的还有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日本、朝鲜的数张发票，是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1979年向国外进口货物所取得的购货凭证。我不识英文，但在数年收藏活动中却认识了发票票头上很是醒目的英文字母“INVOICE”，知道那是“发票”的意思。

这张发票与我国的发票实有天壤之别，系以一张优质白纸用英文打字机打印而成，内容整洁，字迹清晰，素面朝天，票面只有黑白两色，没有任何形式的企业印章和发票监制章。这哪是发票？这纯粹就是“白条”！

不错，这就是一张“白条”，但在人家的国家里就是一张发票；或者说按其内容称为“INVOICE”，而其形式就是在“白”纸上写就的“条子”。时至今日，我们从国外购得货物，取得的依然是这种“白条”，外国人并